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

短篇小说集

上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

短篇小说集

上卷

唐达成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6·北京

本分集主要编辑人员

主 编 唐达成
主编助理 肖德生 傅 活
责任编辑 陶国鉴
助理编辑 李金玉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

短篇小说集(上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43.5印张 6插页 925千字

1986年5月北京第1版 198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355·63 定价:(精)11.50元(平)8.90元

中国新文艺大系总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 周 扬

总 主 编 陈荒煤

副总主编 冯 牧 李 庚

总 编 委 陈荒煤 冯 牧 赵 寻

张 庚 孔罗荪 王朝闻

李 庚 江晓天 许觉民

《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各分集主编

理论一集	李庚	戏剧集	吴雪
	许觉民		杜高
理论二集	朱寨	电影集	陈荒煤
理论三集	王朝闻	电视集	赵寻
短篇小说集	唐达成	曲艺集	陶钝
中篇小说集	江晓天	音乐集	李凌
诗集	邹荻帆	美术集	华君武
散文集	袁鹰		王琦
杂文集	曾彦修	摄影集	徐肖冰
	秦牧	舞蹈集	吴晓邦
	陶白		游惠海
报告文学集	柯岩	书法集	沙孟海
儿童文学集	金近	杂技集	夏菊花
民间文学集	钟敬文	史料集	张炯
少数民族文学集	玛拉沁夫		



中国新文艺大系主要工作人员

编辑部成员	宋文郁	陶国铨	邢沅
	郑荣来	王玉璋	
编辑部主任	陶国铨		
副主任	王玉璋		
出版负责人	李湜	陈树彬	方翥之
装帧设计	张慈中		

出版说明

(一)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十多年来，中国的新文艺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深刻地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它是本世纪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对于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编纂一部反映“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优秀成果及其发展历程的拔萃本总集，目的是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研究、总结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衍变的规律和历史经验，提供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我们也期望这部总集，能帮助广大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选择精英，统览各个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从中汲取教益；并能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和研究中国的新文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二) 《中国新文艺大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的指导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精选、严选、拔萃与代表性相统一的标准，力求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反映我国新文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概貌。

(三) 《中国新文艺大系》按历史时期分辑，由近及远地编纂出版。从“五四”运动前后到一九八二年底，共分五辑：第一辑〔1917—1927〕；第二辑〔1927—1937〕；第三辑〔1937—1949〕；第四辑〔1949—1966〕；第五辑〔1976—1982〕。若干年后，将续编以后的各辑。

《中国新文艺大系》每辑按文学艺术的门类和体裁分集，各辑的分集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所有分集均有主编撰写的导言。入选作品的作者简介汇编于《史料集》。全书索引及必要的资料将另行编辑出版。

(四) 这次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共二十三集。其理论部分包括文艺基础理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文学部分包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散文、杂文、报告文学（包括通讯、特写）、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部分包括戏剧（话剧、戏曲）、电影、电视、曲艺、音乐（声乐、器乐、歌剧）、美术、摄影、舞蹈、书法、杂技；此外，还有一集史料。

优秀的长篇小说本辑不列分集，其目录由《史料集》收选。香港、澳门、台湾作家的作品，因资料不全，难于精确选拔，暂不收录；俟条件具备，另行增补。作品编排一般以首次发表时间或所据版本的时间为序，少数分集分类后再按时间先后排列。注释一律采用原著，凡编者新增加的，均有说明。个别作品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少量的文字改动或由编者订正讹错。

(五) 《中国新文艺大系》的编纂，是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国新文艺大系总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依靠文艺界的大力支持、组织广泛的社会力量进行的。工作中我们还得到有关部门及海内外专家、读者的热情赞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并恳请惠予教正。

中国新文艺大系编辑部

一九八四年九月

導言

唐达成

法国批评家丹纳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用这个见解来观察一下近若干年我们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出某些内在的规律性。十年动乱时期，是什么样的精神气候呢，只能说那是弥漫着个人迷信和封建法西斯气氛的文化专制气候，是文化不仅不能得到生长发展，而且要濒于灭绝的气候。在这种严酷的“精神气候”之下，只能培育出畸形的文艺——带着沉重精神枷锁的文艺，压在铁模子里制造的文艺。即后来被人们统称为“假大空”的文艺。这很象旧社会某些残忍的走江湖的艺人，他们把儿童禁锢在坛子里喂养，于是最后这孩子被泡制成十分可怜也十分可怖的畸形形象，供人进行残酷的戏乐。那个时期文艺的显著特征是：没有任何艺术个性，没有任何真实性，当然也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因为那种“精神气候”恰恰是要窒息、斩断一切自然的、蓬勃的、真实的、具有新鲜活力的生机，所以就只剩下瞒和骗了。

对于这种精神现象，仅仅鄙弃、诅咒、嗤之以鼻是不够的。黑格尔曾经在《美学》中这样提问：“是什么需要使得人要创造艺术作品呢？”他认为“艺术表现的普遍需要所以也是理性的需要，人要把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作为对象，提升到心灵的意识面前，以便从这些对象中认识他自己。”这类畸形文艺，是“四人帮”之流“心灵的意识”的需要，是他们企图强制群众接受这种意识的需要，他们自己确实在他们所泡制的“这些对象中认识了他自己”，所以便得意洋洋地把这些畸形产物奉为“样板”，强行推销。但是，亿万群众在“这

些对象”的畸形面貌中，却完全不能认识他们自己，因为，这是些和他们的实际生活切断了任何血肉联系的产物，他们不能从认识和感情上与这种在铁模子中制造的“假大空”文艺交流、共鸣，甚至用高压的手段驱使他们去“欣赏”，也只能引起更深刻、更普遍的反感与厌恶。因此，随着这种“精神气候”的消失，这种畸形的文艺也注定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正如人们常说的，当党和人民坚决、果断地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的命运的时候，也同时挽救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挽救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命运。这决不是夸张之词。

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路线，和直接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及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一系列文艺方针、文艺政策作出的重大调整，形成了与过去绝然不同的“精神气候”，这是饱受凌辱和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很快就感受到了的。整个国家的客观形势和精神状态的巨大变化与更新，当然要引起整个文艺面貌的变化与更新。

寒凝的大地升起了地温，冻结的空气开始流动着温暖的风，那原来埋在深土中的文学种子，萌动、生长，终于以令人惊喜的一片新绿，破土而出。收集在这个短篇小说集中的作品，就是在这个转折期的黎明时刻，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热流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形成的日益温暖的精神气候推动下，第一批醒人耳目的产儿。可以说，正是短篇小说和诗歌最早地揭开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帷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社会生活以日新月异的速度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各条战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文学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向前发展。尽管现在来回顾这些作品，对于其中有些作品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或许会感到某种不满足，但是，如果我们不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文化背景，那么就应该十分珍视这批作品所曾起过的重大的开拓作用。张光年同志曾经以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这个时期文学现象的特点：“它是人民群众汹涌澎湃的怒海中扬起的巨浪，是地壳里运行奔突了十年之久的地火喷吐的烈焰，是被摧残得枯零凋残的民族大树沐浴春风后怒放的新花。在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浴血苦斗中生存下来的革命作家们，噙着热泪喊

出了人民的心声。”这是相当精确的概括。不是亲身经历过十年苦难坎坷的生活和令人窒息的精神气候的重压，是不大能体会到一九七七年发表的《班主任》和稍后发表的《伤痕》这些作品在当时所起的振聋发聩的作用的。人们从谢惠敏这样畸形而僵化的性格身上，从“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强烈呼声里，痛切地感到，清除极“左”思潮的流毒，挽救一代青年在性格和心理上所受到的可怕扭曲，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伤痕》则通过女知青王晓华和她母亲之间在“文革”中所发生的冲突，描写两代人心灵上的深重创伤，触及了具有普遍意义、而又极其敏感的社会问题。十年动荡混乱的生活，使千千万万家庭程度不同地留下了“伤痕”，严重的甚至被搞得家破人亡，如何愈合这创巨痛深的“伤痕”，是浩劫之后，萦绕在广大群众内心中的隐痛。因此，这些作品激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不是偶然的。一石激起千层浪。以此为发端，一系列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揭露和控诉“四人帮”给整个民族和千百万家庭造成深重灾难的作品，如潮水般涌现了出来，其中如《顶凌下种》、《杨花似雪》、《弦上的梦》、《小镇上的将军》、《李顺大造屋》、《月食》、《灵与肉》、《内奸》等等，都成为传诵一时，令人感叹，使人激愤，促人警觉，发人深思的佳作。对于这批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如何评价，如何估计，曾经有过不同的争议，但就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以为至少有这样几方面的重大影响，而为后来文学的繁荣与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这批作品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态度直面人生，直面十年动乱的灾难，毫无讳饰地、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在“四人帮”肆虐时期所经受的巨大痛苦、悲伤、愤怒和反抗，真实地揭露了种种邪恶黑暗势力如何打着极“左”旗号，践踏人的尊严和灵魂，制造了大大小小令人震惊的血泪悲剧，深刻地揭示了个人迷信和各种形式的封建主义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的巨大危害，从而恢复了文学和人民、和社会生活的血肉联系，提出了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有力地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与人民的不正常关系。文学不再象“四人帮”时期那样，是一种异己的、令人厌恶的力量，而是能够表达他们的所思、所感，并使他们为之激动、感到亲切、唤起共鸣的精神力量。

第二，这批作品的创作实践和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深刻思想内容、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有力地冲击了“四人帮”所制定的种种机械模式与僵死规

定，有力地冲击了强加给社会主义文学的种种精神枷锁，并且证明，他们所鼓吹的“三突出”、“三结合”、“主题先行”等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荒谬主张，是把文学引向绝境的根本原因之一。受到群众广泛欢迎传诵的这批作品表明：彻底摆脱、否定、摒弃这一套散发着形而上学、庸俗社会学气息的僵死桎梏，带来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复苏与新生。

第三，更其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这批作品的作者率先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冲开禁区，犹如第一声春雷，第一场春雨，使得成千上万原来深埋于文学沃土中的文学种子苏醒了。十年动乱中，许多同样经历过、感受过、体验过暴虐和凌辱，同样在内心凝聚着强烈的悲欢情绪、纷繁印象和人生经验的作者们，不仅被这些作品所吸引，而且极大地启发了他们，他们发现就在自己和周围的生活中，同样有着许多可以尽情倾诉的内容，这就为新时期文学继续发展做好了准备。

有人对这批后来被笼统称为“伤痕文学”的作品，曾经有所非议，认为有的作品过于消沉、过于感伤、过于悲观了。其实，经过十年之久的动乱，出现了一些带有这类色彩或情绪的作品，并不奇怪，这里需要的是更多的理解，而不是苛责。何况，就总体而言，这些作品勇敢地批判林彪、“四人帮”之流的罪恶，无情地揭露他们推行的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大量社会矛盾和社会悲剧，无论对于认识动乱时期，认识我们的社会，还是认识这股邪恶势力的本质，都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这不仅是对于思想解放运动的强烈呼应，也是实现拨乱反正这一时代任务的亟需，它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是积极的，应该充分加以肯定。其实，只要稍微细致一些地观察这些作品，就会感到这类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否定的形式来肯定生活，作者在激愤或悲痛之情中，爱憎是异常分明的，它们憎恶、鞭挞、否定理应为历史所摒弃的假、恶、丑，肯定、向往、呼唤那理应为历史所肯定的真、善、美，尽管在内容深度上、情感分寸上还有某些可以商榷和研讨之处，但绝然有别于单纯的悲观主义或虚无主义的作品，在悲剧的形式中，汹涌着的却是反映历史要求的潜在威力。比如《小镇上的将军》，写的虽然是一个受迫害的将军的悲剧命运，但是，当小镇上的群众理解了将军博大的胸怀后，将军之死就激发起了人民最深沉、最高贵的感情，不管有什么禁令，都不能阻挡人民“用蛮横和平静的狂热”，按照古老的礼仪风习，最隆重地哀悼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极其动人地显示出

有如大地般深厚的民族性格之美，这是任何沉重压力所扼杀不了的。又如《内奸》，写的是一个旧社会的商人，抗日时期曾经帮助过新四军，在“四人帮”时，横遭迫害和打击，並强要他诬陷栽赃已经成为装甲兵司令员的老同志，虽然在种种非法酷刑下，他不能也不愿昧了良心，硬是顶住了那些造反派的阴谋，而表现出一个普通人的正直的心灵。由此可见，对这类作品笼统加以指责，是很片面的。问题恐怕恰恰相反，许多作者慧眼独具之处，正在于透过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极其尖锐的矛盾、极其深重的苦难，不仅有力地鞭笞和控诉了邪恶势力和极“左”思潮，而且热情地开掘出了蕴含在人民灵魂深处的最美好的东西。

一九七九年末，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是文艺界经历了多年风雨，跨越过艰辛岁月后的一次大会师，大欢聚。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会上致了祝词，他热情地肯定了文艺队伍的素质和文艺工作的成绩，深刻地总结了历史教训，特别是对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指导思想：“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他还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邓小平同志的祝词，给整个文艺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温暖。文学工作迅速地有了新的发展，这也突出地反映在短篇小说创作的新的活跃和新的开拓上。

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于若干年来历史发展的更深刻的反省和思考。人们在痛定思痛的时刻，不能不感到，林彪、“四人帮”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以能够出现，能够挥舞着“最最革命”的旗号，肆无忌惮地进行罪恶活动，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只是几个“衣冠楚楚的骗子”为非作歹的结果，而应该看到这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有着十分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探索和思考产生这些现象的因素

及其土壤,不仅使得作家的视野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中去,也深入到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过程中去,就成为这个时期不少短篇小说的显著特色。比如受到好评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就是从思考历史教训的角度,写出了五十年代大刮浮夸风时期,基层干部在“左”的思潮和官僚主义作风、特权思想的侵蚀下,如何脱离群众,漠视民间疾苦而转化为群众的对立面,作品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又如《记忆》则写一个年轻的女放映员,早在五十年代,就由于偶然放倒了有领袖像的影片,被不问青红皂白地扣上了可怕的政治罪名,受害达二十余年。一个人仅仅因偶然放颠倒了影片,就被颠倒了她的一生。这个悲剧深刻地揭示出:荒谬的个人迷信观念,早在多年前就已在人们的头脑中和社会生活中形成危害了。对于这样的教训,不能不令人震动。

其次是随着题材禁区的被突破,作家的视野有了极大的拓展,无论对历史的纵深探索,还是对社会领域的广泛涉猎,都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各种问题、各种人物、各种社会关系、各种陈腐观念和习惯势力所形成的不同层次的矛盾和冲突,都在作家敏锐观察之列,而其探索之深,发掘之广,更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由于多年指导思想失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迟缓,生活环境的闭塞,长期封建历史积淀下来的污垢,不仅没有得到有力的扫除,有时还在貌似合理的形式掩盖下,有某种程度的孳生,这一切渗透在家庭婚姻、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人际关系等等方面,引起了许多作者的深切萦怀和思考。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思想发现,提炼主题,开掘新意,熔铸为动人的艺术形象。比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不仅描写了小豹子和存妮粗野质朴的爱情,在山村封建残余意识的重压下,如何造成了惊心动魄的悲剧,而且深刻地揭示出,由于农村生产力发展迟缓形成的严重贫困,竟使残余的封建意识获得赖以寄生的基础。曾经为抗争封建式买卖婚姻而冲破枷锁的菱花,竟然也由于解救家庭的债务和困厄,而准备为“五百块现钱”的财礼,将自己的女儿变相地卖给别人,当女儿激愤的指责使她震惊时,她不能不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日子怎么又过回头了?”这沉重的问题,已越过了她个人的不幸,而使我们联系到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历史内容,这是值得认真思考和回答的。又如为人称道的《心祭》,写了一位含辛茹苦的寡母,为抚养几个孩子一生历尽艰辛,当儿女都长大成人后,她领略到自己“一辈子没人

疼，没人爱”的深沉痛苦，内心巨大的寂寞，使她重又萌生了爱情的渴望和向往，她希望求得一丝终生未曾享有的慰藉。然而，这小小的合理愿望，竟遭到身为党员、干部、团员的儿女们的断然指责，认为她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竟然有此见不得人的非分之想。终于，这善良的母亲郁郁而终。她默默地来到人间，又默默地怀着内心孤寂而去。小说以一个终于醒悟了的女儿的沉痛自省的口吻，和极其细腻真切的文笔，有力地揭示出，在日常的家庭和亲人的关系中，封建道德观念也仍然在左右着人们的灵魂，甚至渗透在新一代人的血液与骨髓中，扼杀着合理的人性与人情，制造着意想不到的新的人间悲剧。作者通过对于人们灵魂世界的深刻剖析与透视，提出的封建道德观念和妇女解放的重大课题，是震撼人心的，艺术上也富有感人的力量。此外，象《爬满青藤的木屋》、《爱，是不能忘记的》、《蓝蓝的木兰溪》等篇，也都从独特的角度，深入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折射出生活中种种陈腐观念和习惯势力，如何压抑和凌辱了美好的感情和追求。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们无论观察的才能、思想的才能还是艺术表现的才能，都有了非同一般的发展，与初期相比，显然是更趋于成熟了。

第三，一代知青的生活和命运，一直为许多作者所关心和注意。这是因为许多作者自己就经历过“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坎坷。一代知青在十年动乱中被浪费了的青春、血汗和泪水，他们的迷惑、彷徨、痛苦，都曾被许多作者以充满同情的笔，生动地加以描绘。如果说在开始时，这些作品更多地还是控诉“四人帮”极“左”路线给知识青年带来的不幸和苦难，激愤的情绪中常常不免夹杂着玩世不恭、悲观、迷惘、困惑的色彩，那么，随着生活本身的发展，党的政策的落实，对于一代知青命运的思考就变得更为深沉而坚实了，许多青年作家从知青不幸命运的展示转向了对于一代青年心灵跋涉历程的探索。强烈的激愤情绪的风暴过去后，代之而起的是对人生目标、生活目的、生活意义、生活态度更为切实，也更为深刻的思考与追求。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所表现的知青陈信的经历和思想，就很有代表性。他插队十年，虽然也已在外地当上了中学教师，但他梦寐以求的却是回到繁华的大城市。几经周折，他如愿以偿，回到上海的家中，接了退休妈妈的班，似乎人生列车终于抵达了终点站；然而，很快他就因家庭中新的矛盾，生活中无聊、庸俗的追求，亲人间的算计、疏远和隔膜……而陷于“莫大的失望”

中，不仅十年往事中所具有的“充实感”令他回忆和品味，而且也使他领悟到，没有人生目的而贪图安逸生活，不过是一种庸俗和肤浅，生活的真谛决不在这里，人生的列车也决不能停靠在庸庸碌碌的终点。这篇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显然具有新时期的特点，也反映着回到城市的知青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与此又不同，这部作品是以一种粗犷雄健的笔触，描写了当年北大荒的一群垦荒者。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他们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去开垦人迹罕到的“鬼沼”，自然是当时错误路线所制造的悲剧。在这些年轻人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有着被极“左”思潮扭曲的一面，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停留在令人泪下的伤感上，而是以一种悲壮的情怀，十分动人地表现了当时的一代青年，怀抱理想，奋勇进取的豪迈气概，他们在“鬼沼”为垦荒而英勇搏斗的精神，他们在集体中体现出来的博大而崇高的友爱，他们热望创造新世界的高尚信念是纯洁的，也同样是真实的，即使在今天也决不应该否定，而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作者正是从这样的高度，完整地把握和反映了复杂的生活真实，显示出对于历史，对于生活的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

第四，这阶段的短篇小说，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有了重大的突破。长期以来，我们有些军事题材作品，常常摆脱不了对战争过程的一般化描写，敌我态势的分析，战役思想的解释等等，写到人物时，也往往只是停留在惊险情节的设置，和人物英勇行为的描绘上，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现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而对指战员的日常生活、心理情绪、精神面貌则很少挖掘，军人生活与整个社会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互相影响，也很少触及，部队自身在战争和建设中的重大矛盾与斗争更是极少得到反映。这种情况和过去理论上的形而上学、庸俗社会学、无冲突论是密切相关的。这不能不影响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发展。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这种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变。《西线轶事》就是一篇具有突破性、影响深远的作品，作品中着重描写的英雄形象刘毛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和那种按照某种模式泡制出来的所谓高大完美的英雄不同。这个经历过十年动乱的青年，虽然身上不免带有某种偏激，甚至留有玩世不恭的烙印，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这个有头脑而又敏于思考的青年，内心深处更多萦绕的却是民族的安危、国家的兴衰，这正是他在自卫反击战的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献出了年轻生命的

内在根据。这篇作品不仅写了战争和牺牲，更多地是写了战争中士兵的灵魂。六个电话女兵在战斗的日常生活种种细节和插曲，使得作品不仅更具有生活的魅力，也使得六个个性不同的女兵，更显得生气勃勃。她们通过艰苦战争生活锤炼出来的机警和勇敢，决不是架空的渲染，而是非常生动，非常真实可信的性格表现。在这方面作品所取得的经验，是十分值得重视的。此外，象《最后一个军礼》、《三角梅》，虽然都不是正面表现军营中的战士生活，但是，不论在战士复员的旅途上，还是在美校学生与站岗哨兵的偶然邂逅中，都并没有妨碍作者从指战员这类日常生活的层次中，表现出革命军人的情怀和气质，从而开掘出富有诗意的内涵，这是很可称道的。

随着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迅猛发展，从农村到城市出现了空前蓬勃的新局面。党中央制定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基本方针，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各条战线和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一系列决策，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整个社会进入轰轰烈烈的改革热潮之中。一切窒息、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陈规陋习，禁锢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官僚主义和陈腐偏见，妨碍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旧心理，都不能不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和冲击。文学在推动这场深刻的变革方面，显然可以，也应该发挥巨大的作用。短篇小说，呼应这个强大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要求，也迅速作出了反应。《乔厂长上任记》就是首先敏感到这个历史要求和人民愿望，而作出了生动反映的优秀之作。这篇小说一发表就激起了强烈反响，甚至有的工厂贴出了：“欢迎乔厂长到我厂上任！”的大标语。人们把蒋子龙笔下的人物，当作生活中的真人来呼唤，说明乔光朴这个艺术形象，是深深引起群众共鸣，反映了人民的所思所想所求，而具有充沛的时代精神的新人物。乔光朴这个具有坚定信念与理想的进攻型性格，面对着的是：“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冀申之流。蒋子龙把这喻为复杂的蜘蛛网，“这个网的线是用他们的权力、地位和个人愿望织成的，他们是这个网上的蜘蛛，在这个网上四通八达，来往自如，哪一条一动，他们就立刻爬过去，把好处抓到手。”锐意革新的乔光朴，以他自己的胆识、魄力、才干，大刀阔斧地向这个蜘蛛网展开了果敢的冲击，虽然他的冲击并不那么顺利，他的方案也未

必全都切实可行，但他那闪耀着理想光芒的性格力量，和奋然革除旧弊的顽强追求，却透露了时代的强大信息，也深深震动了读者的心弦。它的脍炙人口，广为传诵，决不是偶然的。以《乔厂长上任记》为开端，反映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的作品，成为一股文学潮流应运而兴。《三千万》这篇小说的积极主题，被评论家称之为“在‘现状’前树起了一面耀眼的战旗”，同样写了省轻工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丁猛对于“谁也不敢碰的‘现状’”的冲击。作品不仅解剖了“现状”的脓疮，揭露了在腐败的“关系学”上结网营私的严重祸患，也展示出了我们社会和我们党的健康力量如何与这种弊病交锋搏斗，以及以丁猛为代表的先进人物，在决心变革现状时所具有的不可遏阻的威力，从而反映出我们时代在艰难中起飞，在变革中前进的基本面貌。而王蒙的《春之声》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和透露了人们渴望有大的变革，渴望祖国有新的发展的心理状态。刚刚从发达国家考察归来的工程师，坐在春节临时增设的闷罐子车中，这里的拥挤、嘈杂、闷热，和他从国外获得的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种种联想纷至沓来，这既使他气闷，又使他感慨，然而就在混乱中逐渐有了秩序，嘈杂中逐渐有了平静，一支明快、流畅、欢乐的《春之声圆舞曲》从录音机中奏鸣起来，于是他感受到了生活中蕴藏着的转机，感到了对于未来的信心。闷罐子车固然是滞重的、杂乱的，然而，它在前进着，在春之声的伴奏下前进着。小说采取了某些“意识流”的跳跃的、印象交错的写法，使作品容量更扩展了，而且似乎更有了某种概括和象征的意味。此外，收在这个集子中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路障》等篇，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急待变革，而又充满酸甜苦辣的现实，给人的感受是深切的。而且对于认识我们所面临的复杂生活，也很有启迪。

这一时期反映变革巨流的短篇小说，还更多地着眼于农村，这是不奇怪的。党中央所制定的一系列新的农业政策，激起了农村经济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空前地调动和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种变化一直深入到了农民精神世界的最微妙之处，似乎农民原来的感情状态、心理状态，一下子被打破了，出现了空前的积极性。《乡场上》就是受到广泛好评的一篇。小说写的是乡村中极琐细的小事，两个女人因孩子打架争吵起来，惊动了书记，他要农民冯么爸来作证，开始时这位老实农民躲躲闪闪，觉得为难，因为他得